

第八卷

Vol.8

公共管理评论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清华大学出版社

公共管理评论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第八卷)

Vol. 8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公共管理评论》是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组编、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份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专业学术出版物。第八卷共收录 8 篇论文、1 篇评论以及 7 篇书评。所收录的论文反映了国内外公共管理最前沿的一些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包括西方社会、经济与政治的文化基因、转型国家公私伙伴关系的治理研究、中国地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及机制分析、金融生态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分析、汶川特大地震五大极重灾区政府应急能力评价研究、中国政府官员的晋升竞争机制与学习动力分析等问题。评论收录的 1 篇是关于全国性医疗卫生政策评估的方法论策略——墨西哥全民医保政策评估的经验的文章。书评是对三本译著、两本外文著作和两本国内著作的介绍和评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共管理评论.第 8 卷/《公共管理评论》编辑部主编.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5
ISBN 978-7-302-19908-3

I. 公… II. 公… III. 公共管理—文集 IV. D03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8493 号

责任编辑:周 菁

封面设计:王凤芝

责任印制:杨 艳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http://www.tup.com.cn>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装 订 者:北京国马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80×255 印 张:13.25 字 数:291 千字

版 次: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2770177 转 3103 产品编号:033044-01

学术委员会

主 编: 巫永平

副主编: 彭宗超

English Editor: Nancy Hearst

学术委员会主席: 薛 澜

学术委员会委员(以汉语拼音为序):

曹俊汉 台湾大学
陈振明 厦门大学
楚树龙 清华大学
崔之元 清华大学
邓特抗 香港大学
丁宁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胡鞍钢 清华大学
胡 伟 上海交通大学
景 军 清华大学
李 强 清华大学
李善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林尚立 复旦大学
卢 锋 北京大学
路 风 北京大学
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
史天健 杜克大学
王乐夫 中山大学
吴德荣 莱顿大学

王 名 清华大学
王浦劬 北京大学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
王有强 清华大学
魏尚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萧全政 台湾大学
许成钢 伦敦经济学院
杨大利 芝加哥大学
杨燕绥 清华大学
姚 洋 北京大学
于 安 清华大学
张成福 中国人民大学
张秀兰 北京师范大学
周志忍 北京大学
左学金 上海社科院
J. P. Borns 香港大学
A. T. Saich 哈佛大学

助理: 冯 焱

地址: 北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00084

电话: 010-62789461

传真: 010-62782605

E-mail: Review@mail. tsinghua. edu. cn

目 录

论文

- 西方社会、经济与政治的文化基因(一): 源头 梁鹤年 1
从议程设置到弹性: 适应欧洲的法国政策决策
Richard Balme Cornelia Woll 50
转型国家公私伙伴关系的治理研究 张万宽 杨永恒 65
中国地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及机制分析
张焕波 马 丽 李惠民 齐 晔 80
金融生态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分析 韩廷春 赵志赞 98
汶川特大地震五大极重灾区政府应急能力评价研究——基于受灾群众评价视角
陈 升 112
中国政府官员的晋升竞争机制与学习动力分析 荣 飞 卢大鹏 132
双向短缺: 基本药物政策的制度分析——兼评“新医改”方案的缺陷
胡颖廉 薛 澜 刘宗锦 144

评论

- 全国性医疗卫生政策评估的方法论策略
——墨西哥全民医保政策评估的经验 和经纬 161

书评

- 张夏准:《富国的伪善》 严 荣 171
橘木俊诏:《日本的贫富差距——从收入与资产进行分析》 马朝红 174
刘苓玲:《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城乡衔接理论与政策研究》 郭宇强 178
王怡:《宪政主义: 观念与制度的转捩》 陈一林 183
芭芭拉·凯勒曼:《追随力: 追随者们如何创造变革并改变领导者》 战伟萍 186
约瑟夫·奈:《领导的能力》 李 扬 192
奥兰·扬:《世界事务中的治理》 马 丽 199

CONTENTS

Articles

- The Cultural DNA of Western Society, Economy, and Politics: The Beginnings
Hok-Lin Leung 1
- From Agenda-Setting to Resilience: French Policy-Making Adaptation
to Europe Richard Balme, Cornelia Woll 50
- A Study of Governance in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Wankuan Zhang, Yongheng Yang 65
-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Mechanisms for Actions in Climate
Change by China's Local Governments
ZHANG Huanbo, MA Li, LI Huimin and QI Ye 80
- A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s of the Financial Ecology on Economic Growth
Tingchun Han Zhizan Zhao 98
- A Study of Government Emergency Capacity in Five Areas Very Seriously
Affected by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Based on Victims Appraisals
Sheng Chen 112
- An Analysis of the Competitive Mechanism for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Promote and Build a Learning Government Fei Rong Dapeng Lu 132
- Dual Shortages: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Essential Drug Policy—On
the New Health Care Plan in China
Yinglian Hu Lan Xue and ZongJin Liu 144

Comment

- The Methodological Strategy for National Health Policy Evaluation: The
Case of Policy Evaluation of Mexico's Seguro Popular de Salud
Jingwei HE 161

Book Reviews

- Chang Ha-Joon: Bad Samaritans: the Myth of Free Trade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Capitalism Rong Yan 171
- Tachibanaki Toshiaki: The Wealth Gap in Japan: An Analysis of income
and Assets Chaohong Ma 174
- Lingling Liu : Research on the Join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the in
China: Theory and Policy Yuqiang Guo 178
- Wang Yi: Constitutionalism: Changes in Ideas and Institutions
Yilin Chen 183
- Barbara Kellerman: Followership: How Followers Are Creating Change
and Changing Leaders Weiping Zhan 186
- Joseph S. Nye, Jr. : The Powers to Lead Yang Li 192
- Oran R • Young: Governance in World Affairs Li Ma 199

西方社会、经济与政治的文化基因(一): 源头

梁鹤年*

摘 要 本文是一系列探讨西方社会、经济与政治文化基因文章的首篇。现代西方人为西方文明定位的理念不离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资本、国家。他们也以这些作为观察与衡量别的国家、别的文明的参照。这些理念是怎样演变出来的? 会怎样演变下去? 要了解西方文明就得了解西方人对生命和生活的看法。生命的意义可从犹太和基督的教义去了解, 生活的素质可从希腊和罗马的文明去了解。这些文化基因支配着西方人的宇宙观、人生观和社会观。

本文探索“现代前”(16世纪宗教改革之前)西方人在格物、致知、修身和治国几个层面上的思维, 探索这些思维的发展过程和相应的社会、经济与政治背景。目的在于鉴认现代西方文明用以定位的理念的源头。在此基础上, 以后的几篇文章会追踪每一个理念的演变过程。

关键词 西方文化, 社会, 政治, 历史, 哲学

前 言

要了解西方文明就得了解西方人对生命和生活的看法。归纳起来只有两条: 生命的意义可从犹太和基督的教义去了解, 生活的素质可从希腊和罗马的文明去了解。犹太之神的权威和基督之神的慈爱使西方人有了超越个人价值的生命意义。希腊的理性和罗马的秩序为西方人对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苦与乐确立了标准。

生命与生活孰重孰轻是可以选择的。有人只想生得有意义, 不管活得苦与乐; 有人只想活得快乐, 不管生命有没有意义。生得无意义又活得苦就是沉沦; 生得无意义但活得乐则是行尸; 生得有意义但活得苦却是苦差; 只有既生得有意义而又活得快乐才算是真的喜悦。西方传统的主流是想生得有意义又活得快乐。且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 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通信地址: School of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Queen's University, Kingston, Ontario, Canada K7L 3N6; E-mail: leungh@queensu.ca。

起

应该是公元64年的事吧。仲夏7月18日的晚上,罗马城失火。尼禄(Nero)皇帝疯了,罗马在烧,他在弄琴。烧了七天七夜,罗马城变成废墟。总得有人要负责任,基督徒遭殃了。

帝国边陲的犹太省(Judea)是犹太人的聚居之地。在庞大帝国千万子民中,只有他们是崇拜“唯一真神”,拒绝参与罗马众神的祭奠,包括对皇帝的效忠祭奠。犹太人很“刁顽”,多次抗拒帝国的压力。他们既自骄也封闭,认为他们是真神的“选民”,等待他们的真神救赎,既不往外传教,也不接纳别人入教,更不与外族通婚。因此,虽然帝国对他们的效忠存疑,但地远人少,也只算是癣疥之患。

但三十多年前出现了变化。有一个叫耶稣的犹太人,自称是真神的儿子,拯救世人的基督,吸引了不少追随者。犹太的长老和经师们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妖言惑众,征得罗马总督的默许,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严禁他的门徒宣扬他的教义。他们在犹太省到处搜捕,并知会旅居各地的犹太人举报,务求肃清这些离经背道的“基督之徒”。^①

在族人的排斥之下,这些基督徒决定向外邦人传教。传的是什么?

犹太人对真神崇拜,出于敬和畏,他们有“创世记”的故事。神创造了人,一男一女,叫亚当、夏娃。神本想他们快快乐乐地住在伊甸园,开枝散叶,与神为伴。但人既好奇,也不安分,偏要尝尝神说不能吃的禁果,犯了“不听命”之罪,叫“原罪”(Original Sin)。非但他俩被赶出了伊甸园,受生老病死之苦,七情六欲之困,他们的子孙,也就是所有的世人,都背上了这“原罪”,都要受这些苦困。但是神也慈悲,答应将来有救赎的一天。这个救赎者会是神的儿子,他会出于神的“选民”(Chosen People)。犹太族被挑作选民,不是因为他们特别精英。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是个普通的小族长。神挑

^① “基督之徒”(Christians)中的“基督”(Christ)就是“救赎者”(也可称“救主”)的意思。耶稣自称是基督,因此,凡信耶稣就是救主的人,都是“基督之徒”,也可称“基督徒”。这与“基督教”是两回事。

公元初,基督徒受罗马帝国的迫害,他们的组织是地下的,但所有神职却要追溯到耶稣所选的门徒和他们之间的分工和组织。直到4世纪时,基督教被帝国认可并成为帝国的国教,教会的组织遂模仿帝国的组织,特别是教皇一职(追溯到耶稣门徒中的首席,彼得)。但这时的罗马帝国已开始衰落。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把帝都东迁,帝国分裂东西两半,教会的组织也发生变化。东罗马(拜占庭, Byzantium)的教会组织叫东正教会(Eastern Church),后来又分裂出很多不同的“正教”,如叙利亚正教、希腊正教、俄罗斯正教等。西罗马的教会组织叫罗马教会,也叫拉丁教会(Latin Church,因为它以拉丁文字为正规文字),又叫罗马天主教(Roman Catholic,即现在的天主教)。中古欧洲的基督徒全属于罗马天主教。

16世纪的宗教改革是反天主教的改革。改革派纷纷从天主教脱离,通称“誓反派”(Protestants,来自Protest)(一译“更正教”)。“誓反派”派别繁多。16世纪以来又不断分裂、创设,现在都叫“基督教”(也称“新教”,以别于“旧教”的“天主教”)。“基督教”教派数以千计,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圣公会、循道会、路德会、浸信会、长老会、摩门教、宣道会、末世宗徒会等)。

简单地讲,现今基督徒的教派分为三类:天主教(或称旧教,是最早的)、正教(罗马帝国东迁之后的各种正教)和基督教(或称新教,是宗教改革之后的众多非天主教和非正教的教派)。三类的教徒都是“基督徒”,但只有一部分是“基督教徒”。

此外,对神的称呼也要澄清。神只有一个,可称天主、上帝、耶和华或神。但神是三位一体:圣父,称天主圣父,也可称上帝或神;圣子,也称天主圣子、耶稣或基督;圣神,也称天主圣神或圣灵。

选了他,是为要显示神的威德,可使顽石开花,为要给世人启示神的意旨是不可用人的尺度去推测的。他可以把一个寂寞无名的小民族提升做他的选民。神的唯一要求是犹太人对他绝对信赖。阿巴郎被选中,带了他少少的族人到处流徙,途中多少危难困境,都是经神的照顾安然度过,最终在犹太地方落根。几百年来,内忧外患,却是依赖神的指示去应付。但犹太民族也是个刁顽的民族,屡次背叛和试探神。神对他们总是原谅多于处罚。因此,他们对神是既敬且畏。敬是因为这个全能的唯一的真神选了他们做救赎的工具;畏是因为他们知道屡犯不改,罪该万死,真神慈悲才得超生。因此,他们立了一套巨细无遗的法典,谨慎遵守,以免神怒。为此,犹太人也称为“法的民族”(People of the Law)。这是犹太教(古教)的故事,记载在《旧约圣经》。

接下去是基督徒的故事,记载在《新约圣经》。亚伯拉罕被选后过了几千年,神的救赎终于来了。神的儿子降生为人,取名耶稣。耶稣就是基督(救赎者之意)。他牺牲自己,代人类赎了原祖亚当和夏娃的罪。从此,人再回到神的怀抱。耶稣传道三年,归纳起来只有两条,爱神和爱人。爱神,因为神爱你;爱人,因为神爱人。这个以爱为本的基督道德,跟以畏为本的犹太法规发生冲突。犹太人有 613 条守则,严格地规定了人的起居作息和与外邦人的关系,作用是把神的诫命法律化,兢兢业业地谨守着,以免神怒。从这个角度看,耶稣的言行就是离经背道——守安息之日他却动手脚去治病,不洁的外邦人他偏要交好。他更批评犹太当权者的伪善。耶稣爱人的行为触犯了犹太畏神的法典。加上他自称是神的儿子,更是万死之罪。

耶稣救赎之功和以爱为本之道,基督徒称之为“福音”。犹太主流非但不接受,更加以排斥、迫害。于是,基督徒就向外邦人传道。外邦就是罗马帝国的千万子民。犹太人在宗教与文化上闭关自守,但在经济上却很活跃,旅居各地的很多。于是基督徒就从这些众多的小核心向外邦人宣扬福音。福音的字义是“好消息”。外邦人听到的好消息是这样的:①耶稣救赎不限于选民之列,谁信谁得救,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②爱是新的诫命,特别是爱人如己。外邦人,特别是妇女和低层阶级如奴隶、士兵,很快就被这个爱的宗教吸引住了。耶稣的被钉死和基督徒的被歧视更引起他们的共鸣。有些找到了慰藉,有些找到了解放,信徒越来越多。帝国,尤其是帝国的当权者,开始感到威胁。他们的理解如下:如果神是唯一的,那么罗马众神,包括神圣的皇帝的地位何在?如果爱是一切,那么帝国权力的基础何在?在现实里,妇女们、奴隶们、士卒们开始反思。在统治者眼中,这些都是危险信号。

大火是个好借口。尼禄皇帝指使基督徒纵火,下令镇压。大的理由是基督徒拒绝参与罗马众神的公开祭奠,亵渎了神明(很反讽地,犹太人也不参与罗马众神的祭奠,帝国虽然不满,但因犹太地远人少,并未有认真对待。假如犹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教也许不传出犹太,教徒会少得多,就不会招帝国之忌。犹太人也不会被镇压遣散,流失所近二千年了)。从 64 年到 311 年,前后 10 个皇帝,基督徒殉道者的血,滋润着这个爱的宗教不断成长。

君士坦丁大帝登位。他母亲是教徒,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他与争位者战,士卒中基督徒很多,他答应他们在十字架旗帜下作战,功成之日,对基督信仰解禁。313 年他

履行诺言。颁布“米兰敕令”。从此,基督徒就可以在帝国内自由活动和传教。380年,狄奥多西(Theodosius)一世更定为国教,也就是天主教^①。与此同时,帝国也发生了大变化。

狄奥多西一世是一统的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个皇帝。他死后(395年)帝国就永远地分为东西两半。情形是这样的:罗马在公元前510年“发芽”,是共和体制的。几百年不断扩张,到了公元前1世纪末,凯撒大帝(Julius Caesar,虽然他并没有称帝)和奥古斯都大帝(Augustus)才建成帝国,版图差不多覆盖了当时的西方文明世界。帝国的黄金年代是奥古斯都大帝正位(公元前27年)到马可·奥勒利乌斯皇帝(Marcus Aurelius,著名的恬淡寡欲的皇帝,《沉思录》的作者)去世(180年)的两百年。

但是,盛极必衰——道德败坏,生活奢靡,宫廷内讧。外面蛮族觊觎,北面的哥特众族(Goths)与日耳曼各族不断入侵。罗马人逸乐过久,斗志消失,遂招募外族,以夷制夷。当然,这些蛮族也看透了帝国的弱点,先是诈财,继而侵地。美其名曰做帝国的屏障,实则是据地称王。君士坦丁大帝于324年把帝国主力东迁,建都于君士坦丁堡(现今的伊斯坦布尔),成为东罗马(拜占庭)。从此东西罗马各自为政,但东罗马自命正流,视西罗马落后。西罗马的最后崩溃是西哥特人于376~382年的大入侵。452年塞尔柱突厥部落(Seljuk Turks)更直取罗马城,教皇在城外为民求情,才免遭灭城之难。476年西罗马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s)被迫退位,西罗马从此湮没,欧洲也进入了所谓的“黑暗时代”。

帝国崩溃,“罗马太平”(Pax Romana)随之消失^②。无远弗界的帝国司法制度和基础设施没有了,贸易、工业马上停顿下来。一统的文化和教育中断了,愚昧文盲就成为普遍现象(高级官员也有是文盲的)。政治混乱,地方不靖,人民自然不能安居乐业。农田变森林,农奴到处流窜。农业生产仅供糊口,自然不能支撑工商业的发展。小幅的地盘由小头目割据,眼界也变得小了。公元400年到公元600年,欧洲人口少了30%。

天主教会,也称罗马天主教会或拉丁教会,是唯一亮点(天主教会与东迁后的东正教会同出一源,但彼此如同陌路,教义分别不大,但系统与体制有很大分别)。教堂、寺院(特别是大的修道院)成为乱世中的避难所,保存、延续、甚至发展西方的文化和教

① 天主教原先分五个“教区”:罗马,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安提诺和亚历山大。4世纪末,帝国东西分裂,西面就是罗马天主教,或拉丁天主教(以拉丁文字为官方语言),延续至今。东面虽然有4个“教区”,但君士坦丁堡成为东方天主教(以希腊文字为官方语言)。到了1054年,东、西教大分裂后改称为东正教。东正教后来再分裂出希腊正教与俄罗斯正教。其他3个“教区”日渐式微,但仍称正教。到了7世纪,回教兴起,这些正教更遭摧残。

② “罗马太平”是18世纪著名历史学家吉本(Gibbons)在《罗马帝国兴衰史》中创造出来的名词。罗马由共和转帝国是从奥古斯都大帝开始的(公元前27年前后)。在此之前,罗马将领们不断在外征伐,在内互斗,绝无宁日。从奥古斯都大帝正位到马可·奥勒利乌斯(Marcus Aurelius,罗马著名的恬淡寡欲的君王)去世(公元180)的两百年,是罗马相对太平的日子,内战、征讨、海寇都比较少,帝国内的商业、教育和司法都相对有秩序。主要的政治原因是皇帝事事以“中肯”为原则,成功地约束将领们,而且又没有发动大的征伐,免掉了将士们邀功骄横。

育;提供一套平行的司法和管理机制维持社会的基本稳定;开发一套具体而微的工、农生产和贸易运作维持经济的基本活力。于是,教会逐渐承担教育、社会与经济的核心任务。更突出的是,蛮族的入侵(凡是不属于地中海部族的都被称为蛮族,其实是现今的东、西、北欧)却成为传教的大好机会。唯一的真神和以爱为本的教义感化了各蛮族,于是,天主教从罗马帝国转衰时期的国教成为全欧洲的正统宗教,宣扬神的爱又同时维持人间的秩序。

这个以罪为经、以爱为纬的宗教是西方文明的基因。它对神、人和世界的演绎支配着中古欧洲的社会、经济与政治近千年。其中,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是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甚至可以说,今天西方的人生观,如果不是顺他的,就是反他的,但都是以他为起点。在他的时代(354—430年),基督徒终于得到帝国认可(313年),其教成为国教(380年),以致帝国开始崩溃、灭亡(476年)。他的思想反映了这个时代,也反映了他多姿多彩的一生。

年轻时候,他任性放纵,但也同时着意找寻人生的终向。他才华横溢,30岁就当上帝国米兰皇廷的修辞学教授,在当时这是最高的学术地位。他对声色情欲的追求也是人所共知的。他的名句是:“神,请赐我贞洁、寡欲,但不是现在。”虽然他的母亲是虔诚的教徒,很想让儿子信教,但他倾心摩尼教,相信世界是场旗鼓相当的神与魔永无休止之战。后来找得高僧,一辩之下,大失所望,才放弃这信仰。米兰主教安部罗斯(Ambrose)是有名的智者,开始打动他的心。一天,他听见一个小孩子的声音,不断地说:“打开书看看,打开书看看。”他遂打开手边圣经,刚好是保罗(保禄)致罗马人书第13章第13~14节。“我们该脱去黑暗的行为,佩戴光明的武器。行动要端庄好像在白天一样,不可狂妄豪饮,不可淫乱放荡,不可争斗嫉妒;但该穿上主耶稣基督;不应只挂念肉性的事,以满足私欲。”这段话触动了他心灵深处,他马上改变生活态度,领洗入教。这些,在他有名的《忏悔录》里都一一记了下来。这本真挚感人、剖心之作的世界名著,至今仍是自传的范本。

奥古斯丁的时代距离耶稣在世时逾三百年。逐渐成形的教会遭遇几个心理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严重危机。教会的生死存亡,有赖于它能否从被歧视和被迫害的社会边缘转为被尊崇和被显扬的社会主流,而又不丧失它的宗旨、活力和感召力。奥古斯丁提出应对这些危机的思维和理念,奠定了西方正统人生观的核心。如下。

(1)早期的教徒认为复活和升了天的耶稣很快会再度降临,审判生死者。这叫“第二来临”(Second Coming)。因此,许多教徒放弃家财,全心修行,以期在审判之日获得永生。这也是早期教会急剧增长,教徒舍身殉道的主要原因。但三百年过去了,“第二来临”好像遥遥无期,构成了严重的信心危机。

奥古斯丁指出,何时“第二来临”是神的意旨,不是人可以揣测的。但不管何时,人总是可以在世上建设“神的国度”(City of God,是奥古斯丁的另一名著)。教会就是这个“神的国度”在世间的演绎者和代理人。它以爱来统治神的儿女,远胜于任何以追求自我满足和自我荣耀为中心的俗世王国。这理念演变成为中古欧洲人(特别是十字军

时代前后)“基督之国”(Christendom)理想的哲学(神学)依据。

(2) 公元3世纪左右,来自波斯的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很流行(摩尼(Mani), 210—276年,自认是耶稣信徒)。这与基督徒对神的理念有冲突。假如全善的神是全能,怎会善恶势力相等?奥古斯丁认为恶行不应该归咎于某些附在人身上的恶魔。他离开摩尼教之后,在未成为基督徒之前,提出一个折中的思路,可以翻译为“缺善论”(absence of good)。善、恶不是两元的对立。恶没有独立的存在,它只是善的不足。因此,恶是一种“不完美”(imperfection)。后来他做了基督徒,再把这思路往前推,用“原罪”的理念去解释善恶:“原罪”之前只有善。“原罪”使人类堕落,丧失了为善的理念,只有透过神的爱(love: 神差遣基督来救赎人类)和神的恩(grace: 神使人类能够明白和接受基督的救赎),人类才可以重新走向善。

(3) 贝拉基学派(Pelagianism)盛行于4世纪末5世纪初。它否定“原罪”,认为人类原祖亚当与夏娃不听神命,犯了大罪。但对于人类来说这只是一个坏榜样,并未使后人负上“原罪”,也未使人性完全堕落。人仍有足够的意志力去选择善恶。因此,人对自己的得救与否应该能够并且也有能力负责,无须神恩(神赐给人类意志力之恩),也无须耶稣的救赎。耶稣只不过是给我们做个好榜样,去抵消原祖的坏榜样。该理论完全否定耶稣的救赎之功。也就是说,人只要选择做好事就足够了。因此,该教派对信徒行为的道德要求是极严格的。

奥古斯丁力排这个理论。他对“原罪”的演绎,对西方历史和文明影响深远。他认为“原罪”使人性完全堕落,必需神恩才能得救。而且,得救之恩并不能靠做好事“赚”得,而是神按他的旨无条件赐予的,不能要求,不能赚取,也不能推却。从416年到431年,教会屡次谴责这派为异端,这中间,最坚持的是奥古斯丁。到了6世纪,此派消失,但神恩与善行的关系,至今仍是教义的争论点,也是日后16世纪宗教改革的焦点,甚至演绎为人性是“先天决定”还是“后天培养”的争论点。这些争论是观察西方文明的一个窗口。

(4) 公元3世纪末到差不多整个4世纪,教会内部出现阿里乌教派(Arianism),由此产生分裂。在正统教义中,神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耶稣)和圣神(圣灵)。这也叫“圣三一论”。三位是同性、同体、同等。阿里乌派认为耶稣地位略低于圣父,而且他的神性也不是完全的(虽然是差不多完全)。派中甚至有人认为耶稣是“受造”的,而不是“自生”的。这是教会被帝国认可之后的第一次严重分裂。在以后的几个世纪,经阿里乌派传教士皈依的日耳曼族领导层与教会对抗是为了这一点,11世纪东、西教会的分裂,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这一点。分裂的严重性可与16世纪的宗教改革相比。君士坦丁大帝于325年召开“尼西亚(Nicaea)大公会议”,立下“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为教徒信仰的基础。现今差不多所有基督徒(天主教、正教和大部分基督新教)都接纳“圣三一”的教义。君士坦丁大帝以信徒身份召开“大公会议”,是俗世政权干预教义的首次,也是后来西方政与教的分与合、和与争的滥觞。奥古斯丁用了16年(460—416年)写《三位一体论》(On the Trinity),驳斥阿里乌派的论点,澄清和演绎

教会对三位一体的解释。这本书被认为是西方最伟大的神学著作之一^①。自从教义有正统与异端之别之后,西方任何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社会、学术等)之争都蒙上了“正统”与“异端”的形式。

(5) 公元 303 年,也就是基督徒被帝国认许之前,戴克里先皇帝(Diocletian)下令,帝国内全面禁止基督徒集会,拆毁所有教堂。这为时 8 年的教难(也称“大教难”)是帝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君士坦丁大帝的“米兰敕令”是 313 年颁布的,但当时他只控制帝国的西部,到 342 年才统治全帝国)。教难时,有很多基督徒,包括神职人员,为了保存性命、地位或财产,否认是信徒,背了教。

到了君士坦丁时代,教徒非但没有受迫害,反而成为有地位、有体面的事(特别是在君士坦丁大帝以信徒身份大力支持教会之后)。新入教的唯恐不及,以前“背教”的人自然想返回来,特别是神职人员(神父、主教)。这牵涉到教会的两件“圣事”(Sacraments,罗马天主教共有 7 件圣事):“告解”(Penance)和“神品”(Holy Order)。“告解”是忏悔:教徒犯了罪,向神父“辩告解”(把犯的罪清楚地告诉神父,神父是“听告解”),神父代表神赦罪(圣经依据是耶稣升天前,把赦罪之权交给门徒),被赦的人做了足够的补赎之后,就可重新做人(在世被教会接纳,在天得救)。“神品”是神职人员的资格认可:教徒想做神父,经培训后由主教(高级神职,一般由资深神父擢升)祝圣(圣经依据是耶稣遣派门徒传教),教徒“领神品”后,就是神父,可以行使神职,包括“听告解”。

当时的的问题是,教难时背教的神父、主教可否通过“辩告解”忏悔,重新执行神职?还有,这些背教的神父、主教在教难时行使的神职,如“祝圣”和“听告解”是否有效?教会认为凡悔罪的,经“告解”圣事,必可重回教会怀抱。以前背教的主教、神父可恢复神职。而且,“圣事”是看事,不看人。一个背教的主教、神父如果他仍是按教规去“听告解”、“立神品”,仍是有效。也就是说,向他“辩告解”和“领神品”的教徒都会得到赦罪和神职。但当时的多纳图派(Donatists)就认为神职人员背教十恶不赦,不能超生。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背景。多纳图派的据点主要在帝国的北非属地(北非迦太基,Carthage,即现今的突尼斯,曾经与罗马抗衡逾百年,甚至曾入侵意大利。公元前 3 世纪被罗马击败),这些被帝国以武力征服的子民,本来就对罗马反感。公元后多次的教难,使当地基督徒视罗马皇帝为魔鬼化身。如今,在短短几年内,罗马皇帝变了基督徒,他们就算不怀疑,起码是不消化。叫他们重新接纳那些在教难时背教,甚至助纣为虐的叛徒,叫他们怎能服气?

那时,奥古斯丁是 Hippo 地方(在现今阿尔及利亚,Algeria)的主教。他力排众议,为的是要尽早恢复教会元气,才可以在这个大时代有大作为。让这些背教的人(在奥古斯丁眼中,他们都是被迫的)重返教会是壮大教会队伍的上策。而且,以不嫌旧恶

^① 奥古斯丁写此书有个小故事,反映了他的心态。一天,他沿着海边漫步,满脑子里想着三位一体的道理。这时突然出现一个小孩子,他在沙滩上挖了个小洞,然后跑到海边,用两只小手合起来捧满海水,跑回来把水倒进小洞里。奥古斯丁上前问他,“孩子,你在干什么?”小孩子神色庄重地回答:“我想把这海里的水全放进这洞里。”奥古斯丁笑笑问他,“你真的想用你小小的手把整个大海灌到这小洞里?”孩子回答说:“那你是不是真的想用你小小的脑袋去完全明白神的所有奥秘?”说完,转眼不见了。

的心态去宽恕背教之徒,更能吸引千千万万的教外人皈依天主教。

多纳图派坚持己见,与罗马闹分裂。君士坦丁大帝以教徒身份于317年发兵讨伐,铩羽而归。这是基督徒之间第一次诉诸武力。北非多纳图派与罗马教会水火不容,导致日后天主教会乏力抗拒回教势力从阿拉伯半岛席卷北非。

当时,奥古斯丁支持帝国出兵。提出他的“正义之战”(Just War)理论:“当她的迷了途的儿女强迫其他人走向灭亡之路的时候,教会怎不应以武力去强制这些迷途儿女回归教会?”但是,“正义之战”有三个条件:①有正义和善良的目的,而不是为私利或权力而战;②由依法成立的权力去发动;③在暴力中,“爱”是唯一的动机。人类的权力野心和暴力倾向是无可置疑的,但正如中国的孔孟之说,奥古斯丁(其实是来自基督教义)提出战争的仁义目的和慈爱动机,在若干程度上约束或缓和了赤裸的权力斗争和暴力行为。这“义战”理念深远的影响西方中古的政治权力和国际关系的理性,直到今天。

总结以上,奥古斯丁对西方人生观的贡献如下:

(1)“基督之国”超越俗世王国。这是欧洲中古政治的主流观点,是天主教会支配欧洲政治的权威基础,也成为16世纪反天主教的宗教改革的间接理由。

(2)“原罪”是人类堕落的理由,得救全赖神恩。这是16世纪宗教改革者的理论基础,影响着大部分“基督徒”的人生观。

(3)信仰重于善行,信者得救。这也是16世纪宗教改革者的理论基础,是现今“宗教是私人的事”的政、教分离的理论依据。

(4)耶稣同时是真神和真人。“三位一体”成为正统教义。确定耶稣的神性就是确定教会的权威。这是教义与世俗政治权力的首次结合,也是日后“正统”与“异端”之争政治化的开始(包括宗教与宗教之争和信仰与科学之争)。

(5)以恕为本,为爱而战。这是第一次以武力解决宗教问题,也是日后世俗间“正义之战”的理论基础。

奥古斯丁被公认为“中古的第一人,古典的最后一人”。他承前启后。以基督教义过滤希腊思维(但主要是柏拉图,而不是在13世纪再度登台的亚里士多德^①)建立欧

① 这里,我们碰上了一个差不多可以说是改写历史的小环节。希腊两大哲人柏拉图(公元前427—347)与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差不多是同一时期的人物,而且分属师徒。亚里士多德大部分著作在身后失踪,到公元前1世纪才重现,并流行一时。但在罗马帝国崩溃后其著作再失,辗转滞留在东罗马,然后再被一些回教学者研究和采用。十字军时代开始,其著作转回到欧洲,与其他希腊古哲学典籍一起被翻成拉丁文,揭开了文艺复兴的序幕,这是12~13世纪的事了。因此,奥古斯丁接触到的亚里士多德是经普罗提诺(Plotinus, 205—270)与其学生波尔菲里(Porphyry, 234—304)搜集到的有关逻辑学的一部分。波尔菲里对基督徒的反感是出名的。他曾说过:“众神们都承认基督是最虔诚的,但基督徒却是迷惘和狠毒的。”(波尔菲里生于基督徒被帝国认许之前)有史家认为这是虔诚的奥古斯丁没有更多采用亚里士多德的理由之一。

这是很关键的史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虽是师徒,但思路差不多相反。在宇宙观上,柏拉图重“真”,亚里士多德尚“实”;在推理上,柏拉图是演绎(deductive),亚里士多德是兼容演绎与归纳(inductive);在求知上,柏拉图讲“洞识”(insight),亚里士多德讲“体验”;在政治上,柏拉图落点在“君”,亚里士多德落点在“民”。这些互相补充以致互相冲突的思路,奥古斯丁只得到一半。柏拉图/奥古斯丁的思维影响中古欧洲近千年。到13世纪,亚里士多德的经典重回欧洲,由阿奎纳(Thomas Aquinas)带头反思。从此,亚里士多德/阿奎纳与柏拉图/奥古斯丁两条思路的纠缠,在一些地方相得益彰,但在另一些地方却水火不容,支配着西方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取向与演化,直到今天。

洲的文化传统。现分析一下奥古斯丁对柏拉图的过滤。

奥古斯丁所接触到的柏拉图,主要是“新柏拉图派”(Neoplatonism,起自普罗提诺,Plotinus,205—270)。虽然这派有浓厚的神秘气氛,但它除了超灵仪式外,在哲学和政治思路上仍是源自柏拉图。

这里,笔者想谈谈柏拉图/奥古斯丁的4个思路:格物(真)、致知(求真)、修身(伦理)和治国(政治)^①。

1. 格物(真)

柏拉图认为物质世界不是真的“真”(real)。“真”是独立存在的,先于和超于物质世界的、永恒的、不变的。他分开了“形”(form,也就是“真”,也可称为“理”,idea)和“物”(matter,也可称“现象”或“象”)。“形”才是“真”,“物”只是“象”(“象”不是假,是虚而已)。“物”(“象”)是“形”(“真”)的一种显示。“形”(“真”)是不变的,“物”(“象”)是万变的。每一种“物”(“象”)都预示着一个“形”(“真”),但并非每一个“形”(“真”)都一定有显示它的“物”(“象”)(也就是说,有些“真”的存在是我们无从知晓的)。

奥古斯丁把这个“真”演绎为“神的思想”(“Forms are God's thoughts”,也可译为“神的理念”)。也就是说,神是“真”,而且是唯一的“真”。在教义上,这有很重要的意义:①人不能完全知晓神的思想,更不能完全知晓神的本质。为此,需要信仰,而信仰是种神恩。这些,奥古斯丁在“三位一体”的大辩论中是非常强调的。②人既是由神“按他的形象创造的”(“Made in the image of God”),每个人都得到一点神的本质(特别是人的灵魂)。

演绎在社会层面上(人与人的关系),是“爱人如己”的基础。因为如果人人都是神按他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那就是人人都是“神的儿女”,怎能不彼此相爱。演绎在政治层面上(人与权的关系),就是人人平等的基础。因为人人平等是“爱人如己”的最起码表现。演绎在经济层面上(人与物的关系),就是“共有、共享”的基础。因为共有、共享是“爱人如己”的最基本的行为。

2. 致知(求真)

求真就是去清楚认识上面谈到的那些永恒、不变的“形”(“真”)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柏拉图有名的“山洞隐喻”(Parable of the Cave)就是指出世人往往把当前看见的影子当成真相。他强调,通过我们的官能掌握的只是“象”。因此,对“真”的认识不可能来自官能,也就是不能通过观察外界而得的,而是通过把“理解力”(reason)加诸“早存在我们之内的理念”(innate ideas)。

求真就好像一种“回想”(recollection)。他说:“我们出生的那一刻,灵魂忘记了真

^① 这几个纲目来自《大学》。《大学》,也称“大人之学”,是儒家思想的经典。虽然是封建时代的产品,但也珍藏了人类对理想人生与理想社会的憧憬。这些有关做人处世的理想虽有封建的外衣,但有泛乎人类对真、善、美追求的内涵。三纲八目是《大学》的主题。“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大人”(理想政治家)的描述。要达到这境界有八个方面要努力: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笔者认为其中有几条与西方古今哲人所强调的很相像。中西文化基因当然有别,但笔者相信仍有一层更基础的、泛文化的、全人类的追求,就是宇宙的解释和人生的真谛(格物与致知),个人生活的理想(修身)和群体生活的理想(治国)。笔者用这四个“目”去组织对西方文化的讨论,希望可以方便中西对照。

和美的理念;通过教育,我们可以把这些再找回来。”为此,“理性”(教育就是理性的开发)是求真的唯一工具。奥古斯丁虽然继承了柏拉图的“真”,但他把一切的“真”都归于唯一真神。因此求真就变成了认识神的本质。这个理性与信仰的结合就是奥古斯丁神学的基础。

柏拉图认为并非每一个“形”(“真”)都一定有相关的“物”(“象”)。同样地,奥古斯丁认为神的本质也不是人类能够全知的(例如三位一体的真相)。因此,信仰虽不应违背理性,但理性也不足建立信仰,要靠神恩。奥古斯丁的求真,我们可作如下演绎:按柏拉图思路,如果求真是通过把“理性”加诸“早存于我们之内的理念”,那么,求真就是种“发掘性”的工程。应用到奥古斯丁的宇宙观里,这些“早存于我们之内的理念”只可以来自创造我们的神。因此,求真也可以说是从内心去“发掘”神早种植在我们内心的真理。

3. 修身(伦理)

柏拉图认为人与其灵魂是不可分割的,但肉身却把灵魂禁锢着。他重灵魂,轻肉身。他把灵魂与肉身的关系比做一辆双马战车的御者和马的关系。灵魂是御者,肉身是那两匹血气方刚的雄马,驰骋中遇上了使它们血脉沸腾的雌马,开始不能自制地发汗和咆哮。这个比喻与奥古斯丁个人的人生经验完全相符。因此,自制,尤其是性欲上的自制,是修身的一大挑战。他对人性(意志力)的相对悲观影响整个西方迄今。就是因为西方人对人性不大信任,才要依赖法治、民主去约束。

对奥古斯丁来说,整部人类的历史是一项“救赎的工程”。一切始于“原罪”。人类的原祖,亚当和夏娃,犯下了不服从神命之罪,被赶出“伊甸园”(乐园)。他俩的子孙(也就是全人类)都被感染,一生出来就身带这个“原罪”。

奥古斯丁特别关注“原罪”对人性的影响。神创造人,给了他“意志自由”(free will)。“原罪”的效应是这个意志的完全堕落。也就是说,人类的意志完全受肉身和私欲偏情支配,再没有自由了。此中,以性欲为最(这大大影响西方的性道德观,以致延续至今。这事上,奥古斯丁有点受摩尼教和柏拉图的影响)。他强调人性丧失了“不犯罪的意志”(“the will not to sin”),有以下的论据。

“(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之后)……他们用无花果叶掩盖身体上那些从前没有什么可耻,但现在却变得可耻的部位……吃了禁果,犯了越轨之罪之后,他们为什么把目光投视到这些器官?……这是因为他们的眼睁开了……可是他们从前每天都是看见这些器官……为什么突然地对赤身裸体感到羞耻,对这些器官的裸露感到羞耻,要马上把它们遮盖?是不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些器官——他的在明处,她的在暗处——已不再服从他们的意志控制?这是他们应得的苦,因为他们同样地不服从神。他们不服从神的意向,他们生儿育女的器官不再服从他们的意志控制……”奥古斯丁认为“原罪”使人性完全堕落(depraved),再没有“向善的自由”。因此,除非靠神恩,人是不能回应神的呼唤,也就是说,除非靠神,人不会懂得真正的自由。可是,这个冒犯了神之罪,必须由神来赦免。神就派圣子耶稣来世。他服从神之命,牺牲了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听命之功,补赎了人类原祖的违命之罪。这过程中,救赎完全是神恩,不是人类